

成都文史资料第三十辑

2301
成都少数民族

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成都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成都市伊斯兰教协会 编
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文史资料第三十辑

成都少数民族

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成都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成都市伊斯兰教协会
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邱焰美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古 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成都文史资料第三十辑

成都少数民族

.....
《成都少数民族》编委会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国营荣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08mm1/32 印张 12.5 字数 314 千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708—2/K·574 印数：1—3100

定价：17.00 元

目 录

序	马新业 (1)
---------	-----------

一、人物春秋

我这一生	何雨农 (3)
土家族名人王彦立	汪一立 (16)
革命烈士肖桦	张孝忠 (21)
一生追求进步的杨伯康先生	木斧 (23)
忆父亲余存永	余明琇 余石生 (26)
著名骨伤专家杜自明	杜琼书 周锡银 (31)
杜氏骨科的第六代传人杜琼书	李先梁 杜麒 (36)
蒙古族骨科名医何仁甫及其传人	何天祥 何浚治 (44)
我从事骨伤医学的经历	何天祥 (51)
骨科专家罗裕生	哈培钰 (67)
回忆父亲赵伯钧几件事	赵尔宓 (69)
忆韩怡民校长	苏菲 (82)
献身教育 为国哺才	
——回忆我们的父亲雷履平	雷莹 雷敏 (86)
蒙古族教育家刘瀛臣先生	刘沔 刘淳 刘溥 (93)

一生致力于民族教育的蔡大愚	马明晖 (99)
忆父亲雷国纲	雷嘉丽 雷嘉玲 雷嘉聪 (105)
六十六年的回顾	赵尔宏 (108)
情溢巴山蜀水 开创三峡画派	
——记著名国画家岑学恭先生	胡正南 (126)
苏性若、全泽与都江堰	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 (131)
我的父亲马宗融	马小弥 (133)
蒙古族进士哲克登额	赵泽永 (139)
满族古文学家吴国泰先生	吴静蓉 (141)
怀念我的叔父马继高	马在仁 (146)
回族著名艺人贾树三	茜子 (155)
书法家杨光圻	杨正芭 杨正菴 (157)
我们的父亲虎学澜	虎永思 虎永康 (160)
热心民族公益事业的周子宾先生	马明晖 (167)
爱国爱教 与党同心	
——忆父亲杨培之	杨慈安 (172)
先父刘炳勋片断回忆	刘国源 述 何长明 记 (181)
我所了解的佟毅	罗永庆 (184)
我们所知先父杨叔明的思想转变	杨正芭、杨正蒂 (186)
“仁和号”家三兄弟	马秉彝 (194)
清代爱国将领杨遇春	杨正芭 (199)
杨兰田先生事略	姜梦弼 (206)
一代武林宗师马镇江	马晓东 (211)
查拳名师张英振	张铜霞 (215)
回族拳师马国柱	马光友 (223)
艺精庖厨 名重桑梓	马敬如 (225)

二、往事追忆

王维舟关心西北中学	马嘉荣 (229)
忆祖父与周总理的友情	杜麒 (230)
郭老与回民的一段情	苏菲 (232)
成都回族人民参加的革命斗争	金文林 何长明 (234)
成都满族青年进修学会	苏成纪 (238)
成都市回民青年联谊会	苏菲 (248)
成都军管会批准的第一个人民团体	苏良沛 (256)
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	赵尔澄 何长明 (257)
我所知道的成都回族	杨伯康 (262)
我所知道的成都满族、蒙古族	刘国源 何长明 (267)
成都驻防八旗和平易帜的经过	刘显之 (279)
成都回族人民在日机轰炸中惨遭 杀害的回忆	哈培钰 (283)
回忆彭县回教救国协会	喇文波 (285)
鸿爪留痕忆“回协”	喇文波 (290)
回族青年与《学生报》	苏菲 (293)
成都清善堂	江瑞五 述 虎学澜 记 (299)
忆成都回族青年慰问演出队	马晓东 (301)
忆“回联”暑期学习班	马天秀 马建平 (303)
参加满族参观团的回忆	苏成纪 (305)

三、文教园地

西南民族学院的发展历程	张汉城 (310)
抗战时期的成都西北中学	金鼎铭 (322)
解放后的成都西北中学	蓝绍先 (330)
从八旗学堂到少城中学	赵尔澄 (333)

成都满族、蒙古族教育与三英小学	关俊 (340)
成都市回民小学	伍剑秋 (345)
都江堰市团结小学	马明亮 (349)
中国回教俱进会四川省支部与回民夜校	田丽 (352)
创办三英补习学校及三英学校的回忆	罗泽生 (354)
成都的第一座公园	刘国源 (356)
清真学源堂	亚芳 (358)
成都宝真堂	苏菲 (359)
益智书报社	江瑞五 (361)
我所知道的国民电影院	江瑞五 (363)

四、民族经济

我创造长城牌高级外销麝香的坎坷道路

..... 杨伯康 口述 姜梦弼 整理	(368)
成都马裕隆百货店的兴亡	陈茂昭 (380)
成都回民食品厂	马宝贵 (387)
成都牛羊牺牲业	尤素福 (389)
成都裕华旅馆	张世文 述 马明晖 记 (391)
青白江区的民族经济	杨绍兴 (393)

序

马新业

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伊斯兰教协会、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携手合作编辑出版的《成都少数民族》一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无疑是成都市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喜事。

成都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城市，除汉族外，还有回、满、蒙古等 44 个少数民族。他们自元代先后定居成都以来，在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中，为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改革作出了种种努力，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在文化、教育、武术、医术等方面继承和发扬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学习和借鉴汉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涌现了不少杰出人才，为成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以来，中共成都市委、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全市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及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少数民族中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各类专业人才群星灿烂、层出不穷，为新成都的繁荣昌盛无私奉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有鉴于此，为了保存史实，传示后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伊斯兰教协会和市满蒙人

民学习委员会在广泛征集史料，认真进行核实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成都少数民族》。该书的作者通过亲见、亲历、亲闻的大量生动的历史事实，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从清代到改革开放这段历史长河中，我市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为广大读者了解和认识成都少数民族提供了内容丰富的珍贵史料。

《成都少数民族》的出版不仅弥补了成都少数民族史料出版的空白，而且对于我们加深民族之间的理解和感情，弘扬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巩固和发展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愿该书能成为读者了解成都少数民族的窗口。

征集出版少数民族史料专辑，在我市是第一次，也是一次尝试。由于一些知情人的故去，及可用资料有限，书中仅收录了几个民族的史料，有关其它民族的史料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发掘整理。

1996. 12. 23

一、 人物春秋



我 这 一 生

何雨农

我于1920年出生在古茂州凤仪镇水西上村一贫苦农民家庭。父亲何光前读私塾，苦学中医兼务农，是乡村较有名气的中医。母亲坤氏，是农家妇女，所生二子，我为长子，家中自耕自种旱地6亩，勉强度日。我7岁发蒙，在村里读私塾，10岁以后，由于四川军阀在阿（坝），黑（水），松（潘）争夺黄金开采权，掠夺大烟土，连年开战，派款，要粮，闹得茂州人民鸡犬不宁，饱受战乱之苦、烟毒之害，我的家也因此破产，我只好辍学上山放羊、牧马、割草、砍柴、支应差役，样样都干。14岁那年，我出走威州帮人，当学徒工，年末因家乡形势吃紧，我又回到茂州。

1935年春天，红军进入茂州，父亲与何思敬（私塾老师）、大哥会同亲友知己在村边迎接红军进村，派我到衙门烧茶、带路。红军进村一不放枪，二不打骂人，态度和蔼，同白军“老总”完全两样。红军关于“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是来打富济贫的，要为穷人成立苏维埃政府，自己当家作主”的宣传很快打动了我的心，征得父母同意，我参加了红军，在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二团团部传令班当战士。参加红军的第二天，我便随部队离开了家乡，转战南北。

1935年秋，红四方面军与北上的中央红军闹分裂，我团奉命南下，沿途与敌军激战，尸横遍野，伤亡惨重。大约九十月间，部队到达马尔康之松岗，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长为了改造和帮助红四方面军，恢复了长征路上的红军大学（以下简称“红大”），并在天全县招生。1936年1月，我被选送到“红大”学习，编入特科测绘班。开科主讲政治的是一位从苏联学习回来的越南人洪水同志，他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讲起，使我对中国革命有了一个初步了解。3月初，“红大”奉命转移，进行思想与物质准备，这时，我们一批优秀青年被吸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红大”撤离时，过宝兴，翻夹金山，经懋功、巴县、折多山到达西康省道孚县，不久进驻炉霍，与贺龙、肖克、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率领的长征部队会师。

1936年7月，“红大”在炉霍举行毕业典礼大会。会上，朱德用四川方言发表题为《怎样创造铁的红军》的长篇演说。这是我们入校以来听到的最亲切最朴实的乡音。他主讲红军的官兵关系、同志关系。他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革命同志之间尤如兄弟朋友，连长、指导员犹如家庭长者，要处处关心爱护战士，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是阶级兄弟关系，切不可相互欺诈或打人骂人。这一点是针对‘军阀’习气的。”朱德同志平易近

人、和蔼可亲、仁慈宽厚的态度感人至深，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毕业后，我仍回到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任师部测绘训练班班长。8月初，部队开始过草地、出腊子口，进入甘肃南部，攻克岷县转战于武山、甘谷，10月在会宁与先期到陕北的中央红军会师。红三十一军与红四军一出草地就打后卫，沿途与胡宗南的堵击、截击、追击部队日夜苦战，在山城堡战役中，许多长征路上走过来的战友和同事都英勇牺牲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部队群情激愤，准备上前线杀敌，我受命为七七二团司令部侦察参谋，率侦察分队出关侦察并陵县沿线的日军动态。10月，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先后出关，几次设伏。初战胜利，大大鼓舞了军民士气和抗战信心。其后，在粉碎了日寇对我晋东南的“六路进攻”和“九路围攻”之后，一二九师与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26日，我奉命率侦察分队到平汉路邢台车路侦察日伪军动态，掩护徐向前副师长到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因过度疲劳，身患急性肺炎，病倒在邢台以西黄寺。病愈归队到皮定均营报到，编入参谋连学习，此时正赶上皮部在辽县与石匣间组织进攻演习。师部李达参谋处长前来检查，皮营长（“红大”的同学）要我绘制演习要图，我很快完成交了卷。演习结束后，李达处长问，此图是谁绘制的？皮定均答：是一位“红大”毕业生。不久，我被调整到师司令部任二科侦察参谋，为统帅机关南迁，我率侦察分队南下邯长公路中段，调查兵要地志。为了展开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7月以后，一二九师成立直属晋冀豫军区，从师部机关抽调一批干部成立“边纵司令部”，我被任命为师部作战科地图文印股股长，12月随刘邓东下，到冀南南宫县开展工作。1939年，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依托太行山建立敌后根据地，首长指示我地图股尽快弄清太行山的山山水水，把晋冀豫三省边地连接不起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完整连接起来，

把兵要地志调查清楚，作为“安家立命之需”。我立即组织力量，亲自率小分队爬遍了太行山，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此项任务，刘师长赞誉说：“不愧是‘红大’的毕业生，在师直机关党员大会上授予我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942年5月19日，日军2万多人突然奔袭我太行腹地，妄图把一二九师机关消灭在清漳河、浊漳河的夹角地带。李达参谋长分析判断情况后，命令管理科长周键（四川老红军）和我挑选精干警卫人员先护送刘伯承师长脱离合围，指定了突围转移方向。我们迅速出发，避开地图上显现的路线，摸着走山之缓斜面，于次日拂晓安全突出了重围，接上了外线接应部队。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所写的“一次巧妙的突围”。刘师长安全脱险后，党中央通令嘉奖了我们。

1944年，一二九师直机关，在“精简整编”和整风运动以后，大批机关干部下放。李达参谋长指示我带机关警卫连一个班南下豫北平原新乡地区，以道清路南平原游击区参谋长名义开展根据地。道清路南，这块狭窄平原，大部队活动展不开，只有小分队在这个“格子网”里如同下“围棋”，回旋余地很小，各地据点的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出来合围，而地方社情又极其复杂，在这里长期生存发展，要勇，要谋，否则会被吃掉。当时，我计划以修（武）、获（嘉）、武（涉）为中心，拟在平汉路东，原武、阳武两县建兵营，相互配合，面向新乡和黄河岸之桥头据点，以便于接应我南北交通，监视敌人行动，配合大区作战。这个计划一直贯彻始终。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部队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对当面之敌接受投降收缴武器装备，然而龟缩在豫北新乡、黄河桥北岸据点和焦作一线的日伪军拒绝向我军缴械投降。于是我游击区的武装迅速集中组编成军分区的第五十四团，我兼代团长，配合太行第七军分区张廷发司令和第八军分区黄新廷司令等主力部

队，对豫北道清沿线各据点之敌实施武装攻势，横扫修（武）、获（嘉）、武（涉）、木兰店、焦作等城池，迫使日军缴械投降。

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又挑起内战，我团仍回原地配合地方工作。1946年1月13日，“停战协定”公布后，我豫北前线为了坚持“寸土不让，寸土必争”的原则，委我为前线中校指挥官，保卫根据地的一草一木。

不久，我奉调回太行军区，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今日归来，自然十分高兴。我向秦基伟司令员报到，他转达了军区决定派我去起义部队新建立的民主建国军高树勋部队任军事代表的命令，并批准我结婚。于是我在河南店家里办了婚事，从此有了家室。婚后，我到高树勋总部报到，分配我在第二师田树青部任军事代表。由于部队起义思想准备不足，官兵思想不稳。大军区决定，民主建国军迁入太行根据地腹地长治驻扎，进行整训，对起义部队进行政治教育。从清算经济到诉苦，参加劳动，对思想抵触大、官兵矛盾尖锐的人抽调到建国学院军官大队学习。然而，部队思想混乱，一些反动军官于1947年6月14日发动政变，在军部政治办公室协助下，经过一天的整训，混乱很快平息。事变后，这个部队改编为三个团，任命我为第二团团长。7月，奉命开到冀南编入新组建的第十纵队，我被任命为二十八旅八十三团团长。月末，第十纵队作为第二野战军的第二梯队，在王宏坤司令、刘志坚政委的率领下，南下渡黄河，越陇海，过黄河区到大别山北侧之光山县与从大别山出来的刘、邓统帅部会师。沿途与敌人遭遇，与部队失去联系历尽艰辛，终于进占桐柏县城。此时，接到任命我为桐柏第二军分区参谋长的命令，当即单枪匹马，穿过顽匪控制区赴任。

桐柏第二军分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起矾山至南阳，上连豫西禹州，下接桐柏、江汉平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军分区在此卡住要隘，控制东西南北要冲，建立情报接转站，传

递南方北上的谍报人员，尤以从武汉派来联络刘、邓统帅部的廖运洲部的重要情报。

1948年7月16日，有桐柏军区参战的襄（阳）樊（城）战役胜利结束，活捉敌第十五绥靖司令、特务头子康泽、副司令郭勋祺，歼敌2万余人。二野司令部电令我率骑兵排护送郭勋祺到禹州，释放他经老河口回四川。我在军分区工作一年多，心情愉快，工作有声有色。1949年2月，我又被派往孔从周部特别纵队，完成后勤补充装备要人、要机构的任务。当我把所有人马移交给二野后勤参谋长李静宜同志后，接任二野司令部军政处副处长职务，分管机关直属分队。重返机关，老友重逢，十分高兴。

1949年4月20日，南京解放，刘伯承司令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南京市长，宋任穷为副主任，从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参加对南京的接管，我同李觉处长奉命接管国防部，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8月初，派我到山东济南市交涉补兵事宜。返回南京后即着手准备向大西南进军的各项工作。

我随军南下，途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大大鼓舞了士气和加快了进军速度。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我到达重庆后，代表二野直属机关参加筹备召开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0年1月2日，接中央军委指示，二野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我正在重庆忙于参加地方建政会议时，李达参谋长要我回部队，并说另有新任务。叫我去后勤找姚继鸿商量筹措进军康藏的后勤保障问题。1月8日，中央批准十八军进藏。1月15日，西南局、第二野战军拟定了《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并召见了张国华等军、师两级主要领导干部。从此，紧张的筹措支援工作展开了，二野司令部机关迅速组成支援机构，任命十八军副军长吕炳贵为支援司令员，胥光义（第三兵团后勤部长）为政委，我为参谋长。在机关迅速抽调人员在重庆组成机要科、电台中队、

通讯科、供应科、参谋科，草拟了保障实施计划。为衔接十八军和接管西康的六十二军工作方便配合行动，支援进军康藏司令部于2月11日由重庆移住成都老南门内文庙街。当时，成都平原兵匪不分，一片混乱，成都到双流、新津公路不通，我支援进军康藏司令部只好在城郊收检敌人抛弃的物资装备加以利用和调查康藏的有关资料，同时组织工兵部队很快恢复新津县五津机场的公路交通，工作十分紧张。

1950年4月3日，我支援进军康藏司令部组织第一批汽车团运送十八军先遣部队出发去雅安，为了进军准备工作方便，在邛崃设立医疗站，在雅安设立第一办事处和兵站，开始了进藏的运输筑路支援工作。筑路工程十分艰苦，随着公路的延伸，高山缺氧，空气稀薄，筑路更加艰难，经过苦战于8月26日初通甘孜。

1951年1月1日，昌都解放，成立了解放委员会。从此，昌都成为进军拉萨有依托的基地。

我从1950年1月在重庆野战军司令部受命为十八军副参谋长兼后方部队参谋长进藏筹措支援运输，筑路五年，随军押运补给进军粮草从未懈怠。1954年12月10日，我在昌都主持汽车部队4年来的工作总结会，所记下的运输总量是8951.0423万吨公里，材料补给总值达2499230.4625万元。1954年12月，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在拉萨布达拉宫前的人民广场举行了通车典礼大会。毛泽东主席为公路通车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1955年2月2日，张国华代表毛泽东主席给康藏、青藏公路筑路员工、部队在拉萨举行授旗仪式，后方部队陈明义司令员代表筑路部队和员工接受锦旗，我们在支援进军解放西藏的伟大事业中，画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1955年5月1日，中央军委在全国划12个大军区，西藏军

区归中央军委领导，5月15日，宣布军前后机关正式合并。后方部队司令部于6月中旬结清各项移交之后撤销番号，我在西藏军区没有什么安排了，收拾行李回到成都。7月末，我接到通知，要我到北京总后勤学院学习，9月中旬，我在北京接受陆军大校军衔，“十一”上天安门观礼。我在后勤学院学习了一年半，于1956年3月进入高级班第一期，次年7月7日毕业，原说统一分配，但又接到总政干部部通知：“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点名要我仍回西藏工作”，并说：“担任后勤部长的命令已经公布了”。尽管我思想不通，也只好服从。我到任不久，我军驻守拉萨炮兵团的炮兵主任投降叛匪；9月17日，我后勤部派往日喀则为部队体检的16名医护人员和车辆在羊八井以西遭伏击被全歼，开赴山南的一个步兵营在泽当附近遭伏击，损伤过半。康巴的反叛首领思珠伦扎西、夏格郎加多吉发誓要为“西藏独立”而战，拉萨街头谣言四起、歹徒横行，市民惊恐不安，党内“整党整风”、“反右倾”运动不断，局势越来越紧张。有见于此，我抓了两件大事，第一，加紧从青藏线调运物资，做好拉萨的物资储备及仓库建设；第二，抓紧机关的防卫建设，加修围墙、设暗堡，准备坚守自卫，提高警惕，准备应变。

1957年6月，共和国勋章令字第45号授予我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8年末，我参加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完会后，经三〇一总医院初步诊断我血压太高，胆囊炎症重，我只好回成都都在四川医学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1959年3月，干部部安排我去杭州疗养，在我到达汉口码头时，武汉军区闵学胜参谋长把我接到武昌东湖招待所接待室介绍给总参谋部办公厅同志。不久，西藏的张经武、张国华来到客厅。黄克诚总长也出来了，对我介绍说：“西藏达赖集团闹事了，如何处置，主席召你们来商量一下”。首先要我汇报西藏现有的